

食物的社會設計：桃園跨族裔地區之食物地景

吳振廷¹、周融駿²、黃丰姿³

摘要

「景觀」已跳脫傳統風貌綠美化或實體環境營造，逐漸發展成為「動態、複合、感知」之多重整合意涵，「地景」一詞即可表達此概念，並意調地景經營之重要性。食物地景蘊含在地人、環境、文化與行動之間的緊密鏈結關係，跨族裔地區更可呈現出豐沛的動能及多元發展的趨勢，蘊含「食物串聯」、「社會網絡」、「跨文化脈絡」等實踐理念。本研究為「鄉村」為主體的參與式規劃行動研究，以桃園龍潭與龍岡跨族裔地區為研究對象，探討食物在地景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及累積在生活地景中的層層軌跡。研究發現有三：（一）龍潭舊街區的食物設計行動展開跨文化地景整合的實踐策略；（二）高原社區公民農業行動建構社區照護與物質循環的食物地景；（三）龍岡多元族裔的遷徙與融合呈現計畫性的經濟活動與跨文化的交流，促成族裔之間的相互關照，形成療癒性的食物地景。綜言之，食物社會設計以創新培力之在地著根模式，引導人及社區從自身的改變提升到公共利益的思維與行動，促進在地社區的健康福祉與永續發展，形成一種創新的社會發展轉型與社區照護理念。

關鍵字：食物社會設計、跨文化、食物地景、社區照護、在地著根

¹弘光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助理教授

²中原大學景觀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³大葉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護理學系助理教授

Food-oriented Social Design: Foodscape in Multi-ethnic Areas in Taoyuan

Chen-Ti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Hung Kua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Rung-Jiun Chou,

Associate Professor,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eng-Tzu Hu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a Yeh University, Liberal Arts Center/Department of Nursing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landscape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ly scenic green beautification or physical construction to an approach towards multiple, integrated meanings of dynamics, complex and perception,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landscape management. Foodscape contain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local peopl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action. Multi-ethnic areas can show more energy and multi-development trends, which involve food connec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multi-cultural contexts. This study is a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ocusing on multi-ethnic areas located in Longtan and Longgang,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ood on landscape development and their layers accumulated in our lifescapes. It is found that food design action in Longtan old districts shows a practice strategy that integrates multi-cultural landscapes. Civic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Gaoyuan community develop a foodscape with community care and material cycle. The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thnicities in Longgang indicate planned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multi-cultural interactions. This encourages mutual care and restorative foodscape. In summary, food-oriented social design shows an innovative, empowering, enrooted-locallysystem that leads people and communities from self-development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motes local welfa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s a newer type of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idea of community care.

Keywords: food-oriented social design, multi-culture, foodscape, community care, enrooted locally

一、前言

「地景」就是人類生存在大地上的具體表現，「地景」說明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表達了文化的內容。「文化地景由某一文化群體形塑自然地景而來，文化不是自然所造成的，而是文化和自然的共同運作下創造了社會生活的脈絡，地景正是文化最清楚的呈現（Sauer, 1925）。1950年代Jackson關心的是當代日常生活地景，他認為藉由閱讀這些地景，人們可以更深入了解過去的歷史以及當今的社會，也認為藉由地景，連結日常生活經驗與地域認同（顏亮一，2017）。Jackson和Sauer同樣關切日常的地景，關心日常生活中人們建構出的日常地景。而被塑造的地景敘事著某一特定區域有社會關係的一群人的生活模式、經驗、技術等，以及維繫著這群人的聯結網，如何發掘、解析這層關係網絡是本研究的初衷。

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以胃為天倉」，「胃」字，肉上頂著一片田，一切直指食物之美在於天地與人類自身的和諧共處（楊馥如，2016）。食物是人和大自然的重要連接點。傳統村落社會當中，日常飲食食物即生成於社區土地，因為人依賴於土地，所以依賴於土地而生長的食物，正是在這樣既熟悉又穩定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待社區的食物，存在一種信任感，傳統農村的人、農食、土地與社會關係是鑲嵌一體，尤其土地是農人能夠生活下去的根本，因此強化了以土地為核心的鄉村社會的閉合性（趙旭東、王莎莎，2013）。群體在日常中習慣性透過食物和社會進行連結，從歷史上來看，食物跟隨著文明的演進，不斷地透過食物交換重構社群和自我的關係。然而，回到農業的根本－鄉村，現代性的進程下造成地景與物質、生命、社會的關係逐漸分離、崩解，尤其在商品化、觀光導向的支配下往往看不見自身與地方的關係。本文以食物作為「載體」思索如何以創新的培力方式，找回社區的主體性與自主性，重新連結食物與人地關係。

本文所定義的「食物地景」是連結地方的時間、空間與人間，涉及文化、認同、生活與產業，經由「社會設計」逐步形成「食物地景」。食物社會設計的本質根基在兩個基本面向：食物串聯與社會網絡，社會設計如同觸媒之角色，呈現加乘效應。意即社會設計的導入，擴大了地區發展的行動視野，引導人及社區從自身的改變提升到公共利益的思維與行動，形成一種創新的社會發展轉型。研究問題為食物轉化成文化地景的形塑過程為何？社群在此過程的角色？此過程如何建構一種連結食物與社會的在地著根模式？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是一個以「鄉村」為主體的參與式規劃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葉莉莉，2010），透過田野調查及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本文目的乃以桃園龍潭與龍岡等跨族裔地區為研究案例，探討食物在地景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及累積在生活地景中的層層軌跡。本文的重要性在於以食物社會設計之觀點，探索地方文化的動態發展過程，地方如何在傳統的紋理下建構一個跨族裔的食物地景與脈絡，以促進在地社區的健康福祉與永續發展。本文接下來將先說明研究方法與文獻回顧，之後依地區說明研究案例食物地景現況發展之影響因子及影響程度，最後探討食物社會設計觀點下之食物串聯、社會網絡、跨文化脈絡與社區照護。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個以「鄉村」為主體的參與式規劃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 (葉莉莉, 2010), 以桃園城鄉交界的龍潭、龍岡區域為田野。將龍潭、龍岡的食物社會設計之實踐, 進行理論化的嘗試。從經驗中建構「食物地景」的理論框架。本研究重點在於透過參與觀察及社會設計的行動研究, 研究者主動介入田野中發生的事件, 以社區營造的方式進行食物的社會設計, 持續以理念引導事件的規劃與動員的模式, 以參與行動的角度, 去理解社區在面對事件過程中的轉變與社會關係的再連結。

行動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 在田野上關注食物的現場, 透過社會設計串起食物及行動者, 並探索食物的轉變與社會設計介入的過程。行動研究的社會設計, 是一個研究者與行動者共創的過程, 研究者從實踐過程中探討社會設計對食物地景及社區發展帶來的轉變。

三、文獻回顧

(一)食物地景

食物地景一詞源自於地理學、都市農耕、都市研究、社會科學和公共衛生等領域, 指的是食物環境和食物地理(黃丰姿, 2018)。許多與食物有關的因素, 例如食安、生活型態、工作型態、社會文化等, 影響著地景發展(Roe et al., 2016), 因此近年逐漸重視探討食物、地景與人的交互關係。隨著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的變遷, 人與食物的關係及對食物的感知也在轉變, 因此食物可呈現人類的意識型態, 反映地景特質(Roe, 2016), 意即分析生活、食物及地景的關係, 可理解人們的環境經驗與其社會文化脈絡(黃丰姿, 2018)。

台灣自「一鄉一特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07)的政策引導下, 各個地區開始為了提升地方特色而努力尋找資源、技術, 協助傳統產業的升級與轉型, 再加上政治經濟氛圍的轉變, 台灣本土文化意識抬頭, 帶有強烈族群地域特色的產業在台灣崛起風行, 節慶地景也逐漸成為再現地方的新手法, 例如: 六堆客家文化節、東勢新丁板節、公館福菜節、大湖草莓節、銅鑼圈杭菊等。地方將生活文化或產業活動以創新的「造節」手法, 幾乎成了一門文化經濟的「好生意」, 尤其將食物變成一種有意義的符號, 形塑出地方意象的連結。

黃詩瑜(2011)以銅鑼地區杭菊種植為主體, 探討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的關係, 其指出杭菊成為銅鑼地區一鄉鎮一特產, 肇始於客委會成功推動「五月雪」桐花季, 銅鑼鄉農會在政府輔導及休閒農業潮流下, 擴大舉辦「杭菊文化節」。因而, 杭菊與客家、銅鑼的連結被政策建構出來。因為杭菊的地方魅力, 帶動其生產地周圍的地方建設, 包括銅鑼科學園區、客屬文化園區等。杭菊地景揭示了特色農產品成為地方品牌為農業加值的策略, 其成就也需要地方社會的轉型與支持。我們可從食物地景的變遷作為一種線索, 不僅反映了社會的需求, 其生產模式的改變也調節社會關係。

食物地景呈現常民食物、生活文化與族群文化的鑲嵌。馮植翎(2011)以食物為媒介來探討公館的地景變遷, 即客家醃漬福菜如何透過人與環境間的適應後而形成特殊的地方文化產

業。研究發現，福菜產業地景形塑的關鍵因素乃在於地方居民透過客家醃漬福菜的文化，將人們的行動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進而形塑出富有地方特色之地景。對地方而言，福菜扮演著將過去和現在扣連起來的角色。另外，產業觀光化及節慶化建構出「福菜地景」，成了一個象徵客家聚落的地景想像，地方在每年舉辦「福菜節」的文化活動催化下達到地方產業的自我認同。

洪馨蘭（1998）論述「美濃菸城」符號的形塑過程，將客家文化與作物鑲嵌而形成特有的族群文化產業。而地方上的客家族群也在這個符號中尋求自我認同，並建構出屬於美濃的集體記憶。換句話說，地方群體在精神層面上強調人類的個體，可經由彼此間的交流，而創造出群體文化的觀點（池永歆，2005）。張翰璧（2000）提到桃竹苗的客家族群文化嵌入茶產業，因地制宜所發展出來的產業地景，呈現出移民經驗、移墾、適應生態的環境過程，因此茶產業就成為桃竹苗客家族群的象徵性產業。因此當我們想到桃、竹、苗的茶，便想到客家族群。

（二）食物的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最常見說法為「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的設計，然而，如何在複雜的社會中重新界定「社會問題」為關鍵。食物的社會設計究竟能做些什麼？食是更有渲染力而且參與度極高的新興社區及社群動員模式。食物串聯（food nets, food connections etc.）是當代社區運動非常核心的新趨勢（張聖琳，2015）。民間社會與公民力量察覺必須在飲食生產、消費與農業生產上有所改變而展開了各種行動與抗爭。但和過往社會運動不同，這一次行動者（消費者、生產者）從被動變成主動，積極找尋另類的解決方式。

關於台灣的農食整合平台與參與式農行動，第一類即我們熟悉的有機農業、農民市集、穀東俱樂部、社群協力農業等另類食物系統。第二類為地域振興串聯生產者/店家的類型，例如：津合堂團隊在台東縱谷線的產地餐桌計畫平台，同樣從地方的「內在」為基礎發展微型經濟，透過料理的再現、分享，連結族群、家族、個體生命的記憶。並倡議「半農半X」，鼓勵返鄉年輕人發揮自己X方面的特長協助解決農村的社會問題。第三類為農食整合的平台，譬如：「好食機」團隊的「社區菜市長」，任務在於提供生產者與消費者一個農食學習交流平台，公開分享生產到運送的環節與成本，建立透明、互信的夥伴關係。其訴求在於拉近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群聚多元的行動者，成為一個互助、互惠的共同體，而這些主體的互動轉換而成的協力，大部分都是小而美、強調在地互助，流轉的除了物質外，還有身分價值、情感、生活方式、文化意涵。”生產自己所需的，以及可以相互交換所需的。”⁴

食物與社區力量、地方發展的研究方面，有一部分關注在原住民領域變遷引發食物主權與生計發展之間的研究，另一方面討論公民農業與地方重建力量。例如：鄉村層級有農藝復興運動的崛起及社區支持型農業，概念上透過一個民主、生態的過程將原本已脫離的食物生產體系再次放回社會脈絡，關注社群驅動的力量與土地倫理的對話。都市層級則有市民農耕的研究，包括：可食地景建立互助的食物網絡、小農市集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任機制，浮現農行動。聚焦在社區照護的有南機場社區幸福食物銀行的案例，以食物銀行的獨特性，達成弱勢照顧、社區互助的概念。可知，食物品質建構與地方發展的研究，比較多探討特定產業維繫食物品質的過程或是作用力。

⁴有關農食學習交流平台帶來的互助模式可參見 2014，「小農復耕」，台北：果力出版社。

參與式的農行動，張聖琳（2015）針對新北城鄉交界之地—土城與坪林，指出兩個地區的農耕型態為例，提出了「農行動」的概念，透過農行動可以鏈結城鄉關係以及修補糧食供需體系。研究將農行動定義為「有農耕經驗的農民和非農民，因自身的農耕經驗而進一步主動地參與和地方社區有關的發展與保育行動中」，透過發展「參與式農行動」的策略，除了體現農耕者本身的主體性外，也可以修補產業鏈中的城鄉關係。侯錦雄、李素馨、歐雙馨、王乃玉（2010）「野菜共和國」所論述的景觀創造，不僅是一種有機的產業轉型，將野菜的價值轉換到物種保育與土地涵養的過程，並呈現地方生態地景之新風貌，另外一方面是讓野菜成為一種可以被販賣及結合地方智慧的商品。楊蹟駿（2016）認為食物品質可以是一種展現農民主體性的具體象徵，透過「山不枯」團隊在坪林茶葉品質的建構與合作模式，浮現一個與環境、工藝共生的坪林新茶鄉。換言之，透過品質的改變可以實踐新的地域空間地景。

因此，我們可將食物地景看作可食地景（Edible Landscape），以都市農業為例，建立互助的食物網絡，小農市集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任機制。再者，聚焦在社區照護的南機場社區幸福食物銀行為例，以食物銀行的獨特性，達成弱勢照顧、社區互助的概念。簡言之，當代的「食物」不再只是滿足食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透過食物串聯再造社區與地方的關係。這一類的實踐力，不僅提供一種「吃」的新方式，還建立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產銷關係和新的城鄉關係。

(三)跨文化的食物地景

在訊息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必非一組固定不變的符號表徵或行動模式，而是一個流動的場域。在市民社會的日常互動中，人們透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生活實踐，從早到晚在此場域中自我嘗試不同文化的符號或行動組合。這樣的嘗試組合構成一個流動的「跨文化」場域（劉可強、張聖琳，2003）。余舜德（2016）指出一部分聚焦在飲食文化的跨界與地方化的動態過程，尤其是族裔飲食文化在地化的可能性，或是一部分從跨國／跨文化脈絡探討食物道地性的重要性。我們除了要重新定義道地，更重要探討「跨文化參與」過程如何形成？食物、空間與生活文化又是如何因地制宜？又或是緊密相連的？

生產性地景與跨文化的參與，黃舒楣（2011）分析了食物、耕作、移民生活之間的重要關連。文中提到西雅圖或洛杉磯的農夫市集看見由亞裔販賣各式北美超市中難得的多樣葉菜類；在加州墨西哥移民居住的住宅附近，則見到庭院中種植了多種辣椒、玉米、豆類和玉米交替種植，隨時可採收為自家食材，可見移民社群的參與，營造了跨文化的生產性地景，漸漸拓展了主流社會對於景觀和居住的想像，這些可食地景逐漸改變以回應多元文化生活。

同樣的，台灣一直是個多元族裔共存的社會，族群之間必須學習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角度，來關注跨族裔的行為及其文化建構與調適過程。飲食之道與族裔認同的建構有密切關係，但非固定的對應。跨族裔飲食認同在實作、再現與詮釋中協商、調整、構成，如何保存、改變、交流則是現今觀察空間社會的重要課題。Bell & Valentine（1997）從身體—家庭—社區—城市—區域—國家—全球等不同尺度之下來理解食物的消費，從個人的層次上，飲食與身體的文化、美學建構或壓迫，延伸到族裔移民與他們的食物、認同和文化的保存等等。族裔移民會帶著他們的飲食文化移動，也會因為多次遷徙的過程重新鑄造新的飲食文化。食物同時具有鞏固群體成

員身分及跟其他群體區別開來的功能，因此，食物可以區分族群的認同，也形塑出族群邊界（林開忠，2013）。然而，族群又可透過食物交換，編織出超越族群界線，更寬廣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關注跨文化的地景與食物交換的認同關係。我們可將食物的交換看成是跨文化社群建立社會關係與認同的一個重要機制，因為食物生產、飲食行動、乃至於社區結盟建構的食物地景所產生的「社群感」，成為理解群體的重要脈絡。

四、食物的社會設計

本研究場域聚焦在龍潭與龍岡，從三個不同城鄉發展脈絡的案例，解析地方社會的發展議題及社區力，以及地方組織與專業者如何透過食物社會設計由下而上在產業鏈與地方社會之間經營一個的食物經濟體，重新讓經濟生活進入到社區，開啟地域振興的行動策略。

(一)後工業的桃園城鄉與文化發展

本研究選擇桃園作為主要場域有下面三個原因，首先，桃園縣升格為六都，在老街溪開蓋之際，宣告桃園縣重污染工業的退場，作為一個北台灣傳統工業轉型、農業轉型的城市，產業類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快速變動，尤其在城鄉交界的小鎮，可以發現典型的小型商業、農業、物資、交通的交換中心轉換成多塊面都市空間利用（謝佩娟，2014），在大環境快速變動及轉型的趨勢下，處於二線城市或者城鄉交界的城鎮，地方經濟產生什麼樣的結構性變化？再者，桃園在多元文化樣貌與豐富的地景所衍生的產業與日常經濟，社區如何在工業城市轉型的脈絡中，展開地方環境的重構？地方社會面對上述的轉變又什麼樣的依賴與抉擇？

1.龍潭鄉村地景的變遷

桃園的工業開展後對於境內的城鄉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變動。林麗櫻（2007）指出桃園在工商蓬勃對於增加地方就業與灌注地方財源有良好的互動，但各項稅捐實徵收逐年提高，但農家收入卻沒有成長。從產業人口數的變化指出，地區社會的移墾型態逐漸減弱，另外政府的公共建設不足，造成環境品質惡化。我們可以推測這段期間，因為快速工業化帶來地區在農村與環境上的衝擊。龍潭自清代起即是著名的茶葉生產地，至日治時期，龍潭仍然是臺灣主要產茶區，龍潭茶的產量曾經達到臺灣茶葉出口總值的十分之一（龍潭鄉公所，2006）。然而，在1960年代後台灣工業化發展的因素下，龍潭的農村發展因政策的影響而有了以下重大的轉變。首先，農村勞動人口離農或外流，此時和台灣其他鄉村的狀況相似，工廠佔領了原本的茶園生產與鄉村生活空間，這個時期的鄉村呈現農工並重，政策上是要改善農民的生活，但抵抗不住都市的經濟起飛，年輕人選擇到都市打拼，少數人繼承茶的家業，婦女則在小型加工廠打零工，農村地方社會是靜默的。緊接著，在都市土地使用飽和下，政府將非都市土地變成工業區，大量的茶園地景消失，連帶改變了自然、水利與農業建立的地方性。換句話說，茶園消失不只是產業衰退的問題，而是全面影響地方社會、文化與生態。政府的富麗農村之農業「三生」策略帶來轉變，促進鄉村進入多元發展階段，目標將農村引導為精緻化的發展，其中銅鑼圈地區開始設置觀光茶園區，這些新穎的建設讓地景「改頭換面」，對於長期耕耘農村的中生代來說，藉著資源引進，社區往嶄新的家園邁進，也帶動了下一步的農村多元社造與農村再生。

2. 龍岡多元族裔的遷徙

台灣桃園匯聚閩南、客家、原住民、外省以及新住民等族群，是台灣多元社會的縮影，因為多樣的族群在此融合，造就了多元的文化。其中眷村的聚落，即是台灣特殊時空背景下形成的聚落文化，匯集了大江南北的居民，是臺灣社會中豐富多元，且特殊的一個社群文化。中壢市是桃園市內眷村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區，其中中壢、平鎮交界處的「龍岡地區」是重要的陸軍軍事區域，主要的居民為從雲南、緬甸、泰國邊境撤回的國軍。而這些異域孤軍中分為許多群體，分批撤退來台，在背負著歷史家國哀愁的遷徙過程中，藉由一段共同經驗與相似的飲食、文化習慣在龍岡安身立命。這批從雲南、緬甸撤回的部隊與眷村，主要居住在龍岡的忠貞新村。

桃園龍岡地區的移民過程與全球化的都市發展歷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都市擴張，原先位於都市邊緣的眷村，其土地成為都市新發土地的來源，藉著各種都市規劃與眷村改建法規的訂定迅速，配合當前眷村改建的都市更新與未來相關建設，大量眷村土地被拆除改建。1977年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後，全省的眷村都逐步改建成國民住宅，分別選擇遷至其他地區的國宅，忠貞新村於1996年底多數已拆除，至此眷戶們散落各方，拆遷後的忠貞新村原址正興建豪華的集合住宅。對眷戶來說，更經歷了第二次的流浪與移置。有些群體被迫離開了，但有一批外來的穆斯林族群卻深根在此。滇緬軍大部分為雲南人，其中不乏有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加上80年代中期由於外勞政策，許多伊斯蘭新住民搬到了龍岡地區，並且在這裡帶來了他們的信仰與飲食文化。另一部分，龍岡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節慶—米干節，在地方人士的致力推動之下，將原先單純的米干美食節慶，結合雲南少數民族的「火把節」以及泰國的「潑水節」，謙卑地將原先六月舉辦的節慶提前到四月聯合舉辦，無疑是地方對於多元文化的認可，距離龍岡不遠的「馬祖新村」被文化局納為重點文創基地，亦規劃推動眷村飲食文創，有意圖的建構跨族裔文化交流的平台。

3. 地域振興計畫的實踐

桃園產業變遷則從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轉型為以高科技為主的知識經濟發展產業型態，而這些特質在經濟建設、現代規劃術、民間社團力的交融與抵抗之下，引發了蓬勃的社造。若從跨文化地景與社區營造的理論來看，這些異質性的文化、事業體與社區在地景與地方社會的再結構中，透過公民行動形成一個流動的跨文化的協作平台，不同的行動者在公共參與過程，尋找生命與地景的認同，這股力量十分有潛力在後工業轉型中帶動地域振興。

長期以來公部門投入的龍潭、龍岡的建設主要有公共空間調查與規劃、商圈評估計畫及環境營造計畫等三個面向。由傳統顧問公司完成的商圈評估分析著重在環境景觀、街區經營型態的處境，但沒有呈現真實的生活文化與產業結構的議題。龍潭的客家環境營造計畫則以生活博物館的理論基礎提出整合性的市街發展構想，空間關係先於社會關係，自然較少提到經濟體的營造，而龍岡還停留在硬體建設的藍圖。一直到近年桃園地方政府每年編列的商圈輔導計畫與中央經濟部的地方產業發展計畫等資源，開展了龍潭、龍岡的地域振興的計畫。這樣的發展提醒我們，龍潭、龍岡的改變需要的不是大張旗鼓的觀光建設，地區需要的是一種由專業陪伴、社區支持的地域振興行動。

(二)龍潭舊街區的食物社會設計行動

1.近期地方發展

龍潭的部分非都市土地因為石門水庫、軍事的開發限制而保留，整體發展步調比其他鄉鎮慢，以至於相關開發與建設受到一定程度限制，但也因此保留了歷史、文化、產業的肌理。關於龍潭市街發展，理論上位於南桃園的龍潭應會受到鄰近中壢都會區都市擴張的影響，然而在北二高建設之前，因為縱貫鐵路沒有行經龍潭，交通往來受限，再加上城鄉發展的差異下，造成龍潭都市發展的停滯，龍潭核心街區的里，因位在舊街發展受到限制，加上產業停留在內需狀態，因此人口逐漸向外流。

龍潭為桃園市客家鄉鎮，被客委會定義為北部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的重點區域，客家文化結合鍾肇政文學地景的特殊區域，順著規畫完成的自行車道，可以看見龍潭大池、大廟商圈、休閒茶園、老街、富麗農村以及倚著石門水庫的石門活魚大街，更特別的是龍潭號稱「桃園的科技櫥窗」擁有高密度的科技工廠，許多科技新貴移居於此，因而在田野間興起了多樣化且精緻的飲食業者，儼然為創新與傳統兼備的觀光小鎮。從空間政策來看，龍潭朝向觀光與科技之走向，然而，城鄉改造的建設計畫項目，例如：龍潭大池景觀工程、商圈廣告招牌示範區、自行車道規劃等等，與當時台灣鄉鎮的規劃設計方向幾近雷同，看似「鄉村轉型」推力，然而過程中缺乏民眾參與，所以社區的真實需求是否被回應仍是未知。

龍潭是桃園地區保有客家文化較多且較具特色的地方。客家文化運動與社區營造興起，呼應當時「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政策（文建會，2004）。地方政府透過地方特產行銷及節慶活動營造客家觀光小鎮，但也日趨消費化、休閒化與符號化，同時間，政府的城鄉風貌建設、農村再生計畫與客家生活營造計畫，在鄉村工業化與現代小鎮的發展困境中，形成一股客家族群意識串聯鄉村社區營造的力量。近年桃園社造推動區域型平台的運作模式，深入舊街區與鄉村為桃園社區打開全新的視野。然而，經濟體如何與社造平台連結，源自於地方的推動力與外在力量交互作用，如何展開地方參與，在依賴、革新過程中建構出另一條產業的發展路徑？

2.舊街區的地方社會與產業環境

龍潭地區早期因為客家人移民聚集於此處進行農業拓墾，形成特殊的客家庄。客家族群開闢埤塘（龍潭大池），灌溉周圍的村落，寫下龍潭開發史的第一頁（龍潭鄉公所，2006）。而隨著水圳、埤塘、道路的修築，以龍元宮為信仰核心的龍潭市街聚落於是形成。現今舊市區仍保留豐富文化資產，包括龍元宮、龍元路、日治時期歷史建築物武德殿及宿舍群、上下街圳頭伯公廟、文學地景等，均呈現豐富、多元的客家生活樣態。其中龍潭居民的信仰中心龍元宮，是龍潭最早的市街發源地（龍潭鄉公所，2006）。龍元宮及龍元路是早期龍潭地區的商業中心，是南北往來的貨物集散地，舊街區商圈至今仍保有客家傳統商業型態的老街，此處多是自行開店，有特色的老店眾多，包括五金行、雜貨店、布莊、客家美食小吃、油行等等，也有龍潭最大的傳統市場。然而，現今因隨著產業發展的變動與商業環境的轉變，消費已由純粹購物行為轉成文化觀光的消費型態。

龍潭近年來發展雖迅速，但舊街區的發展定位不明，地方政府、民意代表及民間常因地方派系的訴求不同而造成衝突。事實上，龍潭觀光的人數日益增加，仍舊無法帶動街區生意，原因乃鄰近街區的龍潭大池在轉換成休閒觀光功能之後，雖然吸引了遊客前往佇留，但來訪的旅客只停留在大池而走不進舊市區，無法真正接觸地方的生活空間，再加上新設的道路又切斷了街區的傳統紋理。整體來說，外部能量無法與舊街區資源進行結合，無形中造成生活、文化、經濟上的斷裂（Wu & Chang, 2013）。在廟方藍圖中，透過改善龍元宮廟埕廣場景觀與機能，使其成為舊市街重要的地標與節點，不但提高街區公共空間的品質，使得廟埕廣場也成為客家宗教與文化傳承的啟動器。同時間，廟方成立「五穀爺文化協會」與商圈協會合作，推動「社區嘉年華的繞境活動」，讓散布在舊街區外圍的社區可以透過展演在地方現身，甚至不在傳統祭祀圈的社團(新住民、雲南)也被納進來，得到自我與地方認同。因此，新的繞境儀式作為一種新的社會行動再結構了舊廟街、社區、庄頭與祭祀圈的信仰關係，逐漸讓廟埕形成一個跨文化的平台。

3.龍脈地景行動與南瓜地景連結地方認同

神農既是農業之神，亦是醫藥之神，同時照顧著鄉民的身心靈，周邊店家有中藥店、青草店、香店及傳統市集，其食物品質的建構承襲著食農文化的脈絡。為了激發地方對舊街區發展的另一種生活情境想像，學術團隊與五穀爺文化協會共同構思，嘗試將空間與歷史傳說結合，建構一個「尋龍脈」的論述。「尋龍脈」行動有三個層級，分別是：第一層歷史記憶龍脈（memorizing dragon landscape）；第二層遊龍脈（touring dragon landscape）；第三層品嘗龍脈（tasting dragon landscape）（Wu & Chang, 2013）。首先，歷史記憶龍脈：「龍潭大池」有著黃龍升天的傳說，其次是「龍元路」老街流傳的百年精神，最後深入到舊市區的核心「龍元宮」。「龍脈」拉出了一條理解地方意象的歷史軸向，連結了過去、現在、未來，人們對舊街區的地方記憶與地方認同；遊龍脈：以活動「揪團跑龍套」為例，意指大家相約組團，走訪由食物串聯而成的多元景點，在真實且想像的空間中感受舊街區的文化地景、特色店家、廟宇文化，從中與地方文化做連結。特色店家的參訪，目的不是消費，而是在過程中發掘、活化、展現老店特色與傳承產業文化，讓外來參訪者與地方文化做最直接的互動與體驗。事實上，在過程中也展開「品嘗龍脈」的行動，店家與社區經過媒合研發食品，重新建構食品品質，促成了「南瓜派的社會實踐行動」。

關於農食鏈結農村與舊街區-南瓜派的社會實踐，位於銅鑼圈上的高原社區，為了活化農地開始無毒栽種南瓜，收成後苦無銷售管道。於是在學術團隊的促成下，高原社區提供新鮮的南瓜，研發則由舊街區的烘焙業者負責，並以龍元宮廟宇的祈福命名為「金玉滿堂南瓜派」，即食物品質的文化建構，在「尋龍脈」的行動中消費者紛紛探詢南瓜的產地。南瓜派的食物品質維繫者守護農村家園的社區行動，而對烘焙業者來說，因應社區南瓜產地進而規劃一套處理南瓜餡料的工序，也因此，業者學習到控制加工品質並且重新論述食物品質。換言之，食物的社會行動整合了在地食物、地方知識、族群認同，逐步產生一套另類的在地食物系統，進而累積社會資本與信任關係。南瓜派行動最大的意義不只是一個交易的行為，而是在產業端和消費端上同時建立生產者、加工業者、消費者的信任關係，並且重新論述龍潭的農食文化。

「尋龍脈」行動與「南瓜派的社會實踐行動」的初衷不是在建構「一鄉一特色」，也不是在透過主題活動建立商圈品牌形象。它是一個「跨文化地景整合」的行動策略，嘗試以食物鏈結地方的三個環節：經濟社群營造、文化地景指認、社區照護與在地食物系統整合，在傳統或新的紋理下建構一個「食物地景」去理解地方。

(三)龍潭高原社區的公民農業行動與社區照護

1.銅鑼圈上的作茶人家

以社區支持型的公民農業為例，其呈現出一種社區尺度的食物地景，高原社區可作為代表。高原位於龍潭銅鑼圈最南郊的邊陲地區，在地形上為桃園台地最南端、也是地勢最高之處，早期社區以種植耐旱的茶葉維生，與其他農村一樣，均面臨人口外移、老化問題以及農業產業轉型的必要性。在農村再生計畫的十年資源挹注下，社區透過有機農業技術的引進，成功找到轉型的活路，奠定以農食、物質循環結合社區照護系統的重要基礎。

具體而言，社區為了活化廢耕的土地，將閒置茶園的一部份種植有機蔬菜，後來發展成多間具規模的有機農場，並由社區里辦公室提供資源，農場帶領居民進行土壤改良，自行做肥料、害蟲生物防治等，形成了業者與社區的互惠機制。同時間，有機農場無償的將每日新鮮蔬食提供給社區關懷據點的老人食用，由社區廚房的志工協助料理，開啟了有機/無毒農食結合社區照護的機制。現今，社區的農耕是有目的性的生產，讓參與農事的人知道農食供應的對象，所以願意投入無毒耕種；而食用農食的人知道菜的來源，吃的更為安心，呈現共耕、共食與社區照護的循環過程並建立信任機制。後續在計畫的支援下，協助社區研發在地生產、加工的食品，例如南瓜派、艾草等，以及協助社區在埤塘建置浮島耕作等等，將原本已經脫離地方脈絡的食物體系，經由生態棲地、農食文化與公共事務的營造，使生命、物質與土地的交換關係再次回到棲地的脈絡。

源自客家庄地方社會體系的照護理念轉化為社區「共好」的力量，成為推動農村轉型的社會基礎。從家戶到公共空間中，發展出一種公民農業結合社福機制的食物社會設計模式（Chou, Wu&Huang, 2017）。

2.社區支持的農食餐廳

「蔬活有機農場」是農家子弟吳貴盛童年回憶轉化成心田一粒種子，靜默多年後發芽茁壯，驅使他走回爺爺務農的老本行，在產銷順暢在無壓力下，愉快享受田園農夫樂。從茶園變成有機菜園並與下店仔埤塘結合成生態園區，從一顆種子，到一盤盤甘甜味，有機菜園的新鮮蔬菜直送的「蔬活鮮食館」，實踐地產地銷。然而，有機農事與餐飲事業都非老本行，尤其是有機農業一開始推展並不順利，但有幸在社區支持的有機學習網絡中得到資源和技術，使廢耕茶園逐漸轉型成為有機菜園。這兩年來與社區共同推動深度的生態村體驗遊程，由「蔬活有機農場」負責生態教育的導覽，現今農場、蔬活鮮食館與社區協會形成一個協力的生產網絡，以農場為中心，負責管理有機蔬食的生產、加工製成農食料理與農場體驗（吳振廷，2017）。另外，由社區支持的網絡也連結了志工、農會、鄉公所及桃園青農，增加了就業機會，對地方經濟有所貢獻。

3.農為本有機村的農村運動

不單是住在同一地域的人，社區和社群因為追求或關心共同課題和生命價值，使用不同方法，協力發展。從高原社區有機村的歷程可以看見不同機緣、不同年齡層、不同社群和機構推動下的農業復耕行動。這種回鄉、深根的主體結合客家復興運動而壯大，社區透過食物產生新的「環境話語權」，成為桃園客家社區代表性的食品，並鑲嵌著文化主權抵抗資本工業化的積極作為（吳振廷，2017）。長期以來，設置在高原的兩間工業大廠將廢水排入霄裡溪，造成水汙染嚴重影響環境生態，社區帶著有機村的論述，與環保人士向工業區抗議，終於在 104年底，在政府監督下達成工廠「廢水全回收、零排放」並成為桃園區的示範區。106年2月，社區不滿台電要在茶園及有機農場之間興建天然氣發電廠，於是在里長和市議員到電廠拉白布條抗議。黃里長在協調會場表示，*桃園的觀光重鎮在龍潭，龍潭的觀光景點在高原！我們已經做到最大的社會責任，納骨塔也在龍潭，垃圾場也在龍潭，竟然發電廠也要在龍潭！*有機村衍生的環境意識及公民參與力量，讓社區斷然拒絕政府的開發政策，在社區環境正義的覺醒下，政府將鄉村視為鄰避設施的廢棄地及環境汙染的分攤地的措施將被社區力量持續抵抗。

(四)龍岡的遷徙與融合與療癒性食物地景

本章節是以族裔飲食文化來分析食物如何連結歷史、文化與空間，因而建構跨族裔的食物地景。龍岡的滇緬料理是一種戰爭食物，乃是當年滇緬邊境部隊遷台所帶來，帶著戰亂顛沛的元素，中南半島地區的飲食也融入其中，成為一種融合多元族裔文化的風味料理，最具代表性的為「米干」（焦桐，2013）。近年來由於新移民和移工的加入，連帶著引入東南半島之新住民，讓龍岡的飲食文化更顯多元，混雜了伊斯蘭、印尼、越南料理等，使龍岡地區作為一個海納百川，吸納各族裔口味的飲食中心。如今，忠貞新村被拆除了，這些滇緬孤軍仍維持著一個屬於在地的特殊情誼，同時也發展出各樣的組織團體，經由日常性的文化活動與慶典，將遷離居民的生活場域拉回忠貞地區，建構更緊密的文化認同。

1.遷徙與跨文化的飲食交融

龍岡的遷徙故事源起於1945年國共兩黨談判破裂後，中國再度陷入全面性的內戰，1949年國民黨政府迫遷台灣，當時未受共軍控制的雲南一帶的國軍轉進滇南，在緬甸、泰國與寮國的北方，形成金三角地帶。這群雲南游擊隊被賦予反攻大陸的任務，活動在金三角地帶，成為深陷異鄉的孤軍。後來在聯合國的仲裁下，將部隊撤至台灣，這個故事由柏陽先生以鄧克保為筆名，改編成了《異域》一書，民國 70 年代並拍成電影。異域孤軍分為許多群體，分批撤退來台，其中包括雲南漢人、雲南少數民族、泰緬族群等，政府為安置這批來台共一萬多人的軍隊及眷屬，選定位於桃園中壢、平鎮、八德交界處的龍岡地區，興建眷舍，國防部將其賦名為「忠貞部隊」，象徵這些由滇緬辛苦回來軍眷的忠貞精神。⁵當時居住於中國邊疆的孤軍們，在金三角邊境的山區流離、自力更生，經歷不斷遷徙，最後才落腳泰緬邊境建立復興基地，這段顛沛流離的離散、流浪的經驗鑲嵌著飲食、文化習慣，帶到龍岡的忠貞新村。遷台之初，這些台灣的新移民，因為語言與外在環境的隔閡使得他們在生活適應上更顯困難，然而金三角的革命情

⁵ 柏楊，《異域》（臺北縣中和市：躍昇出版社，1988）。

感將其緊緊綁在一起，形成一種文化認同。

龍岡地區自1950年代起，便開始興建大量眷村，周邊的軍眷村密度，甚至一度為全台之冠。眷村是外省人大規模移民最具代表性的群居聚落，遂而成為大江南北家鄉菜的集散中心，在經濟困頓的年代，廚房及食材共享，眷村菜融合了多元族群，同時也撫慰了來自中國大江南北老兵的鄉愁，召喚他們的集體記憶（焦桐，2013），而忠貞新村的飲食深受滇緬金三角戰爭的影響，吸收了滇緬地域的飲食習慣和特色料理，在艱困環境下衍生的戰爭食物也逐漸在龍岡生根，龍岡地區成了異域和異族飲食文化融合的大廚房。由於軍營與眷村的聚集，為了因應貿易及常民的生活需求，以忠貞新村周邊市街為中心形成了忠貞市場，1970年代，忠貞市場集中了全台密度最高的雲南小吃，幾乎每一家都有賣米干，全盛時期多達五十幾家米干店。除了小吃店也販賣各種當地人的蔬果、手工藝品及一般市場少見的異國香料及食品。爾後隨著東南亞勞工來台、外籍配偶日益增加，又加入了泰國、越南、印尼小吃，頓時成為桃園異國飲食文化的聚落。

由此可知，龍岡地區是多元族裔料理蓬勃發展的核心地區，以滇緬料理建構了食物地景。除了撤軍來台的游擊隊，許多雲南老鄉陸續透過依親、成婚來到台灣，這些後期移民亦以經營米干店營生，而隨著近期外勞引進、外籍配偶的普及，這裡的滇緬料理亦揉合了泰國、越南、印尼等口味。俗話說橘越淮而為枳，滇緬料理透過滇緬游擊隊來到台灣，在源源不斷的族裔移民中有所創新與結合，揉合出不同的滋味，展現出多元而特殊的食物。

2.多元的想像共同體

滇緬軍大部分為雲南人，其中不乏有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為了要在台灣恢復宗教生活，有行禮拜聚會的場所，因此1954年在龍岡地區籌建了信仰中心—清真寺，成為滇緬和雲南等族群的信仰中心。龍岡穆斯林的社群成員雖多屬於一出生即信仰伊斯蘭的穆斯林，大致可分為：一是在原本即在鄰近的忠貞眷村生活、成長的雲南裔軍民及其後裔；二是非出生於台，多於1970年後來台永久定居的滇緬軍後裔、泰緬華僑；第三類則為大量東南亞各國來台打工短居的穆斯林，或是已嫁娶台籍人士的東亞外籍配偶在寺活動。陳書偉（2012）指出今日龍岡穆斯林聚落，有來自各地的離散群體（*diaspora groups*）承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離散經驗與認同，這些離散群體在龍岡這個地方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化空間，對此文化空間有著不同的詮釋與認知，因此，穆斯林必須採用各種變通方式與策略性認同的建立來維繫社群的穩定，妥協與調適的作法得使社群網絡穩定與擴大。從信仰來說，伊斯蘭清真寺成為社群發展的核心並以清真寺為凝聚伊斯蘭精神的象徵。從飲食方面來說，由於穆斯林遵從飲食戒律，並對肉類的宰殺及處理過程相當重視，在台灣一般坊間幾乎沒有專為穆斯林設計的飲食，也促使龍岡有清真認證的穆斯林餐廳興起，這些店鋪提供穆斯林可以食用的食物，喚起了穆斯林心中對家鄉味道的想念與記憶，同時，飲食也有在地化的轉變，選用的食材、調味、配方都有因地制宜的表現，並非完整不變地複製原本家鄉，而是鑲嵌在地方的關係上。穆斯林的教徒，固然其來自不同的地方，卻因為自己吃著「同一種食物」而在此感到歸屬感。在龍岡穆斯林餐廳用餐，塑造了一個認同的食物地景，有別主流的飲食風潮，而飲食是一種媒介，維繫了社群的網絡關係（Wu & Chang, 2015）。

3.療癒性的食物地景

飲食是一種塑造身分認同與凸顯地域特色的方式，忠貞新村被拆除，但滇緬孤軍維持著一個屬於在地的特殊情誼，同時也發展出各樣的組織團體如：滇邊聯誼會、雲南同鄉會等同鄉組織。當初迫遷來台時，由於大部分都是雲南鄉親，在文化內化的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文化圈，被迫遷之後的社區居民，經由打歌⁶隊的持續運作與組織活動，成為例行性的打歌聚會。移民社群透過音樂、舞蹈來建構集體的音樂經驗，對「異鄉」進行回憶與想像建構，並透過音樂傳達及展現族裔的文化特色，在離散的經驗裡，重塑一個離散認同。近年政府以眷村文化復興為名，加強對眷村文化口述歷史或各方面的文化聚落調查，舉辦「眷村文化節」等相關文化嘉年華，龍岡透過活絡經濟與復興雲南文化的號召，號召了同鄉會、米干業者與社區組織，在2011年開始舉辦「龍岡米干節」，安排打歌、愛國歌曲演唱、雲南民俗活動等，2014年將原先單純的米干美食節慶，結合上雲南少數民族的「火把節」以及泰國的「潑水節」，為期二周的嘉年華活動，網羅了多族裔的美食、音樂、服飾、文化活動，對外湧入了觀賞的人潮，對內建構了一個包容的食物地景，逐步打開了原本封閉的文化圈。2016年迄今桃園市政府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以為期三年的「跨族裔飲食文化產業整合行銷計畫」以龍岡地區為核心鏈結了八德、平鎮與中壢的產業環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龍岡掌握了當代雲南文化或異域在台灣詮釋的詮釋，重構了社區內與外不同群體的關係，成功的讓地方理解一種以食物品質、文化經濟帶動地方微型經濟發展的動員方式。日常性的文化活動提升到地方性的慶典；生活空間形成多元文化包容的場域，計畫性的經濟活動與跨文化的交流促成族裔之間的相互關照，將遷離居民的生活場域拉回忠貞地區，買菜、飲食、慶典等活動鑲嵌在其中，營造了「療癒性的食物地景」，亦成為城鄉社區營造的另一種模式，擺脫了地區資源不均的處境。

五、討論

食物轉化成文化地景的形塑過程為何？社群在此過程的角色？此過程如何建構一種連結食物與社會的在地著根模式？由本文龍潭與龍岡之跨族裔地區案例顯示，過去店家可能只專注於食物本身、食物供應商及消費者，然透過食物社會設計使經濟體重新連結地方網絡，讓社區充分參與，透過食物品質的重新設計，共同合作、結盟、創造相互支持的關係和鏈結。人們在日常中習慣透過食物和社會進行連結，隨著文明的演進，不斷地透過食物串聯，重構社群和自我的關係。「食物串聯」重新定義了食物與社區的互動關係，這層互動關係重新鏈結在地的生態、景觀與社區經濟，並且之間交換的不單是貨幣，還有勞動、學習、情感與認同，意即社群可以透過食物所引發的行動來延展社會性的網絡，使社會關係得以建立；透過食物社會設計，可以串聯現代的食物體系及地方社會，建構出食物地景的理論思維與實踐方式。概念上如同可

⁶在原忠貞新村還有一個專屬的打歌場，在眷村拆除後已移至雲南公園，專門提供各種大小節慶集體展演的空間，更是居民交流意見和再現文化的場域，村中人與人的關係與例行性的身體展演，標示出空間的意義，形成一個龍岡地區特有的文化地景。

食地景 (Edible Landscape) 建立互助的食物網絡，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信任機制。再者，聚焦在社區照護的層次，達成弱勢照顧、社區互助的概念。簡言之，當代的「食物」不再只是滿足食用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透過食物串聯再造社區與地方的關係。

跨文化脈絡亦是跨族裔地區食物地景的重要表徵之一，跨族裔的社會網絡透過食物的平台緊密連結著。以龍岡地區 (中壢、平鎮、八德) 為例，米干節選用的米干來自八德捐贈的在來米，雲南料理的名菜「大薄片」，其食材豬頭皮來自八德、平鎮的黑毛豬。易言之，跨族裔地區食物地景清楚地呈現從產地到餐桌的鏈結，其生產的糧食與消費的美食之間的供需關係成為推展食物社會設計的有利基礎。更重要的是，在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下，社區照護與社區互助融入食物社會設計，例如龍潭高原社區有機/無毒農食結合社區照護的機制，開啟以食物地景為主軸的健康社區營造運動，是值得期待的。

食物鏈結也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重新定義。行動上不只是設計食物，也在設計社會關係。而這個「關係」顯然不是傳統商品化設計流程能達到，更多是修補與維繫社群關係。龍岡的多元群體建構於一種鑲嵌在具有地緣及跨文化關係的產業鏈，維繫了不同時空的離散認同，創造出更緊密的社群感。社會設計強調為大多數的公眾而設計，即是以人為中心，透過「協作」成就人與人的合作，通過解決社會問題的路徑界定「公眾」，最後形成人與公共之間的關聯性。食物社會設計的網絡即在透過公共性的經濟活動創造物質與非物質的交流，達到產業鏈與社會關係的互信。所以，本研究透過跨文化「參與」、「組織」食物地景的經驗，「設計、測驗、修正、再設計、測試、修正」行動者在食物設計與交換過程的意義與功能，從個體到群體；從私到公；從食物到健康福祉，藉此發展食物地景結合社會設計之行動研究。

六、結論

「景觀」已跳脫傳統風貌綠美化或實體環境營造，逐漸發展成為「動態、複合、感知」之多重整合意涵，「地景」一詞即可表達此概念，並意謂地景經營之重要性。本文所定義的「食物地景」是連結地方的時間、空間與人間，涉及文化、認同、生活與產業。經由「社會設計」逐步形成「食物地景」。食物地景蘊含在地人、環境、文化與行動之間的緊密鏈結關係，跨族裔地區更可呈現出豐沛的動能及多元發展的趨勢，蘊含「食物串聯」、「社會網絡」、「跨文化脈絡」等實踐理念。本研究以桃園龍潭舊街區、龍潭高原社區以及龍岡眷村社區等跨族裔地區為研究對象，以「鄉村」為主體的參與式規劃行動研究，探討食物在地景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力，以及累積在生活地景中的層層軌跡。

綜言之，地方需要的是一種由專業陪伴、社區支持的地域振興行動。透過食物社會設計以創新培力之在地著根模式，在地方紋理下建構一個食物地景結合社會設計的脈絡，分別是：龍潭舊街區的食物設計行動展開跨文化地景整合的實踐策略；高原社區公民農業行動建構社區照護與物質循環的食物地景；龍岡多元族裔的遷徙與融合呈現計畫性的經濟活動與跨文化的交流，促成族裔之間的相互關照，形成療癒性的食物地景。以上均促進在地社區的健康福祉與永續發展，找到生命與土地的認同。

參考文獻

- 文建會，2004，「文化白皮書」，台北：文建會。
- 池永欽，2005，介紹現代地理思想，「國立編譯館館刊」，33(3)：97-103。
- 余舜德，2016，導言：食物的「道地」與跨國／跨文化脈絡，「臺灣人類學刊」，14(1)：1-6。
- 吳振廷，2017，「社區食聯網」的食物社會設計 - 桃園龍潭個案理論化的嘗試，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開忠，2013，「滋味的流轉：遷徙與地域飲食文化的形成」，台北：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
- 林麗櫻，2007，桃園工業發展與桃園社會變遷：一九六六年~一九九六年，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 侯錦雄、李素馨、歐雙馨、王乃玉，2010，野菜共和國—另類文化景觀的參與式營造，「造園景觀學報」，16(4)：31-52。
- 柏楊，1988，「異域」，臺北：躍昇出版社。
- 洪馨蘭，1998，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國立清華大學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聖琳，2015，城鄉交界的參與式農學研究：從新北市案例研究“農行動”如何成為城鄉發展與生態保育的觸媒？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 張翰璧，2000，桃、竹、苗栗產業與客家族群經濟生活間的關係，張維安編輯，「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87-121。
- 陳書偉，2012，中壢龍岡穆斯林的離散認同與文化地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
- 焦桐，2013，「滇味到龍岡」，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 馮植翎，2011，文化生態、地景與技術—苗栗公館客家福菜產業之變遷，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丰姿，2018，景觀與健康研究：環境經驗視角，「設計學研究」，21(2)：65-77。
- 黃詩瑜，2011，客家特色產業與地方發展：以銅鑼杭菊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舒楣，2011，食物和規劃的美味關係：以食物為線索的城市規劃行動，「綠雜誌」，14。
- 楊馥如，2016，「真食義大利：土地、餐桌與人情的一瞬相遇」，台北：時報出版。
- 楊蹟駿，2016，食物品質與地景變遷：台灣坪林文山包種茶產業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7，「地方特色產業深耕加值四年計畫」，台北：經濟部。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桃園縣跨族裔飲食文化產業-穿越南線路整合行銷發展計畫」，台北：經濟部。
- 葉莉莉，2010，參與式行動研究法及其應用，「新臺北護理期刊」，12(2)：59-68。
- 趙旭東、王莎莎，2013，食物的信任—中國社會的飲食觀念及其轉變，「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75-80。
- 劉可強、張聖琳，2003，建立一個批判性的“跨文化的本土”設計語彙藍本反省“模式語彙”對宜蘭

- 演藝廳空間設計的衝擊，「城市與設計學報」，13&14：371-394。
- 龍潭鄉公所，2006，「龍潭鄉誌」，桃園：龍潭鄉公所。
- 謝佩娟，2014，「在「現代性」與「集體性」的提醒與思索路徑」，<https://communitytaiwan.moc.gov.tw>，台灣社區通，2019年1月20日下載。
- 顏亮一，2017，「文化地景概念初探」，<http://iconada.tv/m/blogpost?id=3600580%3ABlogPost%3A683112>，2019年1月20日下載。
- Bell, D., and Valentine, G., 1997, *Consuming Geographies: We are Where We Eat*, London: Routledge.
- Chou, R. J., Wu, C. T., and Huang, F. T., 2017, "Fostering multi-functional urban agriculture: experiences from the champions in a revitalized farm pond community in Taoyuan, Taiwan", *Sustainability*, 9(11):2097.
- Roe, M., 2016, "Editorial: food and landscape", *Landscape Research*, 41(7): 709-713.
- Roe, M., Herlin, I. S., and Speak, S., 2016, "Identity, food and landscape character in the urban context", *Landscape Research*, 41(7): 757-772.
- Sauer, C. O., 1925,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2): 19-54.
- Wu, C. T., and Chang, S. L., 2013, "Re-searching for the drago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re-connecting Hakka cul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new comers in the Taoyuan metropolis, Taiw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01: 256-267.
- Wu, C. T., and Chang, S. L., 2015, "Around the table of the golden triangle: food connections and community networking from Burma to Taiwa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2: 98-106.

